



G 打工前沿

若彩礼成了交易，
何来“好彩头”一说？

陈俊宇

自古皆有的“彩礼”，何时成了“陋习”，这很难考证。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人心思变，对于附着“婚姻”之上的要求与标准总是会变化。

可以接受变化这一趋势，但不能接受变质。很多打工者回农村结婚，动辄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高价彩礼，就是变质之物。“辛苦苦几十年，一婚回到贫困线”，不是段子，而是屡见不鲜的现实。

当高昂的彩礼，需要政府出手时，就不得不反思到底是什么让彩礼变质了？

来看一则最近的新闻。近日，江西省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关于遏制高价彩礼推动婚嫁风易俗的实施方案》，旗帜鲜明反对高价彩礼，因地制宜开展高价彩礼专项整治行动，力争一年见成效，两年出实效，三年见长效，让彩礼回归于“礼”的本质。提倡零彩礼，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一年见成效，两年出实效，三年见长效，这自然是美好的愿望，效果有待观察。检索新闻会发现，不仅是江西萍乡，不少地方也出台了关于整治高价彩礼的实施方案。

今年3月，甘肃省清水县民政局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印发了《清水县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引导婚姻当事人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婚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旧俗陋习。近日，该省定西市也出台了治理高价彩礼的行动方案，明确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

这些“引导”“倡议”性质的方案，毕竟没有强制性，“绣球”还是抛给了每一个具体的家庭。

彩礼是婚俗的组成部分。而婚俗之“俗”，是传统习俗、公序良俗，绝不应该是庸俗、低俗。回到彩礼本身，我们应该看到，彩礼与其说是金钱，不如说是让新婚夫妻有个好日子的基础保障。当然，“万里挑一”之类的寓意，也是为了一个好彩头。

可惜，也不知某年起，刮起攀比之风，爱情成了买卖，婚姻成了市场。于是，表明钞票多少的“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片绿”之类的暗语层出不穷，天价彩礼成了打工者婚恋的沉重负担。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为革除婚俗陋习、倡导健康文明婚俗积极努力。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以期推进社会风气好转。相应的是，这两年全国多地成为婚俗改革实验区。

认同一位学者的观点，他说：“移风易俗不是一时半时的事情。婚俗嫁娶也是亲戚、朋友、同事、邻里之间交流感情的途径，不能完全否认它，不能一刀切。如果希望有个政策、规定就能消除它，这不太现实，有效的方法就是限制一下。”

面对观念之变，行政之手，并不会很快且轻易收到效果。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而深入人心的观念，自然需要时间的沉淀。

幸福的婚姻会告诉人们，彩礼并不能代表什么，更多的是双方对待婚姻的一种态度，而彩礼的多少并不代表未来生活的好坏。所以，仅凭彩礼来判断是否是真爱，无疑过于草率，彩礼成了交易，何来“好彩头”一说呢？

青海力推劳务品牌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为聚力发展培树全省特色劳务品牌，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青海省人社厅会同18部门于日前印发《青海省劳务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通过培育新兴品牌，发展现有品牌，壮大龙头品牌等举措，依托全省优势特色产业，引导培育劳务品牌持续做大做强。

青海按照“壮大现有、发掘潜力、分类打造”目标，制定劳务品牌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着力挖掘全省少数民族、高原生态和非遗资源等特色优势，聚力发展现代化有机农业、盐湖产业、清洁能源和现代服务业等，加强对重点产业发展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力度，支持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同时，推进完善劳务品牌技能人才培育机制，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采取订单式、定向式、共享员工和对口支援建设吸纳就业等措施，推动跨省、跨地区劳务协作，建立健全劳务品牌长期稳定用工渠道，对组织带领农牧民赴海西采挖枸杞等外出就业的，及时兑现补贴。

《意见》明确，青海加强“青拉”“青绣”“海西枸杞”等特色劳务品牌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支持海东市拉面产业园、大数据平台等建设，鼓励各类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化载体、公益性农畜产品市场、电商平台和园区等为劳务品牌企业提供资源整合、场地支持、技术指导和创业帮扶等，支持培育行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持续优化劳务品牌名称、标识、符号等要素，支持有条件的劳务品牌注册申请商标专利，鼓励劳务品牌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品牌保护，持续打造“青农”“青牧”“青海生态游”等形成品牌效应，助力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

本报记者 陈曦

6月2日中午，外卖小哥徐强照常拎着餐品从店里走出来，他手中袋子的系扣处被胶条牢牢缠住，上面写着“签收前请确认封签完好”。

4月1日，北京正式推出《网络餐饮服务餐饮安全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明确规定外卖打包“应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外卖包装封签或一次性封口的外包装袋等密封方式”，以减少配送环节的食品暴露风险。疫情之下的北京，由于堂食取消，外卖需求激增，封签的保护意义更加凸显。

新规落地两个月以来，记者通过持续调查发现，封签使用率不断提高，目前已达到9成。而不少受访外卖小哥却反映，一些封签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实现防撕防替换，有的封签质量不佳，粘贴潦草，甚至容易滋生新误会，加重骑手责任。

“食安封签”如何更好守护食品安全？能否实现对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双重保护？

九成商家为外卖“落锁”

4月3日下午6点，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一家美食城看到，仅有一家米粉店将餐盒用保鲜膜缠住，另有两家店用订书钉将手提袋封好，其余商家并无密封措施。一家档口前，老板边招呼堂食的顾客，边把餐盒塞进塑料袋，草草打两个结，便忙不迭递给外卖小哥。当记者问及为何不贴封签，对方有些疑惑：“肯定不会洒的，您放心。”

4月24日，记者再次探访该美食城。而这一次，近一半的商家已开始使用封签。一位摊主告诉记者，自己接到了平台的后台提示，“我跟隔壁一合计，一起网购了简易胶条，每张还不到两分钱。”

4月30日，北京按下堂食“暂停键”。5月

“食安封签”在北京推行两月以来，使用率逐渐攀升，但不少骑手发现保护效果欠佳。守护舌尖安全，外卖的这道“锁”应该怎么样？专家认为，应培养使用习惯、促使封签进一步普及，并推动封签材质、样式标准化，以实现对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双重保护。

16日，记者在上述美食城选择了一家此前一直未贴封签的凉皮店下单，发现其外卖包装袋外也新添了一枚贴纸，上面标注“若封口已损坏，您可以拒收餐品”。

“封签是逐渐铺开的，5月初覆盖率有6成，现在能达到90%。”徐强说，他平均每天派送60单，近日未封口的只有几单，基本为独立经营的零散商户。“新规颁布前，小店几乎不封口，最近都在陆续采取措施。品牌店更注重形象，几年前就开始统一定制封签。”

在外卖小哥盛霖看来，封签是对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双重保护”。以前餐品有异味，顾客很难判定问题出在商家还是骑手。有一次他派送一份烧鸭，顾客打开发现都是骨头和边角料，一个电话追来，他百口莫辩。“有了封签就能厘清责任，如果封签完好，我就不用背锅了。”

徐强坦言，大部分骑手不会对餐品动手脚，但不排除个别骑手为泄愤而污染外卖，也因此破坏了行业口碑。“如果封签效果好，既能保护食品安全，也能重建我们和顾客间的信任。”

封签形态各异让效果打折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针对《规范》发布的“标准解析与实施指导”，外卖封口样式并无一定之规，只要能够达到“开启后无法复原”的目的，一次性封签、自粘性外包装袋、安全卡、订书钉、密封胶带等方式均可采用。

但徐强觉得，这些方式并非都能满足要

阅读提示

普及之外，更要标准化

封签虽小，却连着商家、骑手和消费者三方，关乎外卖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多位受访消费者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培养使用习惯，促使封签进一步普及；另一方面，推动封签材质、样式标准化，既保护餐品免于污染，又不让骑手陷入新“尴尬”。

“封签成本低廉，实现全覆盖的难题在于各方重视程度不够。”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外卖平台应做好引导，例如向商家推送使用细则、统一制作或采购合规封签，还可以在下单页面标注有无封签，通过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倒逼更多商家为餐品封口。

“以前到店后，我只关心餐品准备好了没，现在还会不自觉地注意打包过程，碰到个别未贴封签的商家，我都会提醒一句，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和购买渠道告诉他们。”盛霖说。

盘和林认为，普及的同时还要标准化，应在实践中摸索，筛选出更加有效的封口方式。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浙江、安徽、内蒙古等地陆续倡导使用食安封签，其中以浙江的规定较为明晰。例如，采用单面封签封扎的，宜满足长≥12.5cm，宽≥2.0cm，厚≥0.75mm；采用双面封签封口的，宜采用中间封口，且封口长度不少于总长度的1/3，宽度不小于2.0cm。此外，订书钉、透明胶等简易封口不能作为外卖封签。

从自身配送经验出发，徐强建议，封签可加上锯齿状或鱼鳞状的防撕设计，并附上店铺图标，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在餐盒内加一层塑封。“菜品刚做好就装进餐盒，盖子很容易被热气顶开，塑封不仅封口效果良好，还能解决骑手最常面临的洒汤困扰。”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为化名)

上海指引家政、家电行业人员有序复工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6月1日起，上海进入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近日，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获悉，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分别制定了该市家政、家电维修服务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

据悉，家政服务业有序复工复产市先从居家服务的岗位开始，包括月嫂、育儿嫂、居家养老服务等，家电维修服务业也首先恢复门店维修服务，待条件成熟之后再恢复上门服务。

根据指引，家政服务人员新返岗后实施闭环管理，指定工作岗位(雇主家)和住所(企业提供的居住点)之间实施“点对点”闭环通行，最大限度减少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员直接接触。对新返岗家政服务人员设置2天静止期，尽可能落实独立住宿，做好每日上午的抗原检测和下午的核酸检测。

上海市家政服务业行业协会建议，按照目前状况，家政服务员进入雇主家后，不要再回企业提供的居住点。钟点工的复工，则要等大公交及总体通行放开后，才有条件实施。

家电维修行业则将根据指引分阶段推进服务。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现阶段首先恢复门店维修服务，待条件成熟之后再恢复上门服务。指引中提出，复工复产的家电维修企业应坚持以提供市民急盼愁服务为优先，抓好制冷及燃气电器修理、空调等电器维护保养、老年群体和特殊人群服务等关键服务工作。近期不安排人员去高、中风险地区进行上门服务。

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同时要求，开设门店修理的，必须在大门外张贴“场所码”，设立专人检查进门用户健康码和测量体温，扫场所码并严格做好相关防疫措施。



上海工地建设忙

5月31日，建设者在西岛金融中心项目工地上工作。

近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临港西岛金融中心项目复工。项目部设置疫情防控、治安保卫和生活保障等5个专项小组进行常态化管理，为疫情防控和日常健康监测提供保障，尽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保证工程进度。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本报记者 李玉波

国家统计局内蒙古呼和浩特调查队的数据显示，传统的建筑业从业者更多的是集中在高龄农民工中，其中30岁以下群体中从事建筑、装修的占15.0%，而50岁以上人群的占比则为42.7%。

另据统计，2007年建筑业一线作业人员平均年龄为33.2岁，2017年为43.1岁，10年时间平均年龄增加了10岁。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国有建筑公司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今在他们公司工地从事重体力工作的5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超过60%，40岁以上、50岁以下的占比30%左右，基本没有90后在干体力活，90后都是从大中专院校招进来从事安全检查、测绘、放线等工作技术人员和监工。

“瓦工、木工、钢筋工每个月的工资都过万元，但90后农民工不愿意再从事这些建筑行业的重体力工作，‘断代’问题突出。”该业内人士说，国有建筑企业已经不再招60岁以上的农民工从事重体力工作了。

内蒙古一家建筑企业的负责人说，建筑业属于劳动强度和危险系数都比较高的行业，建筑工地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虽然现

在工资较高，但没有年轻人愿意干，只能让一些年龄较大但身体情况较好的农民工继续工作。即便如此，用工紧张的情况也一年比一年严重。

国家统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的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分析显示，从年龄看，70后、80后农民工占比超过70%，已成为当前农民工主力军。

“目前，建筑工人群体广泛存在老龄化严重、流动性高、技能水平普遍偏低等问题。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建筑业劳动力供给量预计会持续下降，行业可能会面临持续的、全局性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企业也将长期面临‘用工难’窘境。同时，到2025年45岁以上建筑工人占比预计将接近50%，建筑工人‘老龄化’现象在不断加剧。”南开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系主任陈敏曾在多次公

开场合表示。

人口学家、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呈现出一个稳定的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现象不仅出现在建筑行业，而是所有劳动力群体的普遍特征。具体到建筑业，一部分农民工第二代、第三代在城市长大，从事父辈这种重体力劳动积极性不高。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辛倬语认为，年轻一代工人就业思想有着巨大的变化，更注重权益的保障，建筑劳务传统的用工模式满足不了年轻人的需求。“用工荒”实质上也是“技工荒”。政府、培训机构和企业要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建立社会再教育机制，组织引导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就业一体化，不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水平。

国家统计局呼和浩特调查队数据显示，30岁以下从事建筑、装修的仅占15%——

月薪过万，建筑业为何难觅90后？

呼和浩特市建筑行业一名从业者说，在当地基本上招不到北方的建筑工人，大部分建筑工人来自南方的安徽、四川等地，为了缓解“用工荒”，呼和浩特市的建筑企业用工基本依靠劳务承包商，如此一来，工人们都会因项目而聚，只会跟劳务承包商对接，工程项目完工就分散了，人员流动过大，也没有保障。

“目前，建筑工人群体广泛存在老龄化严